

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

青连斌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要的一点就是调研必须是全面、客观、真实、准确的。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为《浙江日报》“之江新语”栏目撰写的短论，第一篇就是《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其中“准”，就是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只见“高楼大厦”不见“背阴胡同”，只看到成绩而看不到矛盾和问题，只看到亮丽的一面而看不到不那么难看的一面，调查研究就只是流于形式，不仅收集的资料是片面的，得出的认识和结论必然是片面甚至错误的，更会失去调研的意义。只有掌握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才能为正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调查研究当然要看“高楼大厦”，看到成绩，看到发展和进步。但是，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背阴胡同”不能成为“调研盲区”。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靶向治疗，才能真正达到调查研究的目的。

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强调的是一种细致、扎实的调研工作作风。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要大兴务实之风，抓好调查研究，在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下功夫，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调查研究必须扎扎实实，沉下心、稳住身，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调研，尽可能到矛盾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总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调研。既看“高楼大厦”，即被调研单位和地方安排的样板和典型要看，但更关键是通过“背阴胡同”探究真实情况，这体现的是调研者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责任担当。

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倡导的是一种正确的政绩观。高楼大厦是一个城市繁荣发展的表征，是面子，是形象。有的地方出于“政绩冲动”，往往会精心选择一些“好典型”“闪光点”“样板区”作为调研点。但是，真正能体现政绩的，恰恰是“背阴胡同”。一方面，城市的良好形象更体现在背阴胡同能同主干道、高楼大厦一样整洁、干净、亮丽、繁华。另一方面，“背阴胡同”往往也是存在矛盾和问题比较多的地方，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解决，更能体现一个城市管理者的政绩。

2023年4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

“高楼大厦”多数布局于城市主干道的两旁，高大气派，一些高楼大厦甚至就是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背阴胡同”则通常远离城市的主干道，从整体上看，“老、破、小”“脏、乱、差”的情况主要集中在背阴胡同。一个城市不可能只有高楼大厦而没有背阴胡同，习近平总书记用“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比喻调查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调查研究必须全面、客观、真实、准确。

1931年4月，毛泽东在起草一份关于调查工作的通知时就提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正确的调查，首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中国身上。《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是一部以广东为例，向世界介绍中国改革经验的学术性著作。美国学者傅高义被称为“中国通”，他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特别是广东的发展。1979—1988年，傅高义每年都访问广东。其间，他还以马萨诸塞州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会见过多位广东省的领导干部，并同他们建立了联系。1985年傅高义收到了广东方面希望他能够写一本有助于世人了解广东发展成就的专著邀请，随后，他到广东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并于1988年底完成了书稿《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本书生动呈现了1978—1988年十年间广东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对广东改革的动因、性质和过程进行了研究。在书中，傅高义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改革：“一个社会主义省份朝着市场经济走了那么远，这是史无前例的。”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

傅高义认为广东率先进行改革并取得重大成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十年“文革”激发了广东对改革的渴望。“文革”对广东省造成了破坏，除了较为困难的物质生活，人们也缺乏精神的享受、法律制度的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曾长期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前哨的广东，无比期待着变革的到来。其次，香港的发展对广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每年就有几十万人次的香港居民经过广东回内地探访，到80年代后期这一数字迅速增长到1000万人次。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香港现代化发展的加速期。“在

为什么能以近乎奇迹般的速度先行一步

——读〔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 史泽源

80年代末，人口只占中国总人数5%的香港，其对外贸易总额大体等于中国全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两地近在咫尺，在发展上的差距却如此悬殊，自然引发了广东干部群众的反思，使他们对改革产生了一种刻不容缓的紧迫感。最后，党中央给予广东的政策，焕发了广东改革的活力。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党中央率先给予广东和福建两省更多的发展自主权。具体包括在外贸上享有更多自主性，财政上采取包干制，物资调配上自行决定如何使用等。特别是1979年中央决定创办的四个出口特区（后改称经济特区）中，三个位于广东。上述政策无疑为广东改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正如傅高义在书中写到的：“广东的改革，没有北京的全力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

“以近乎奇迹般的速度，创造出一个中国最具魅力和最具活力的城市”

广东的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党中央在领导广东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这是傅高义在考察改革动因基础上关注的

重读经典

严比宽好 精比粗好

——重温邓小平《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

□ 蒋永清

能保持这个比率当然更好。但是，我们不能看到数量不足而机械地去凑足百分之三十。“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关于发展党员的标准，邓小平提出，“不是从时间上拿渡江前后或者是进军西南前后来作标准，也不能单独拿作战勇敢来作标准，主要的是要拿政治条件来作标准”。关于政治条件的具体内容，“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果还不够这个条件，不要勉强去发展。

为了使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严密，邓小平提出应该“以团为单位做一次检查，根据检查所了解的情况，订出党组织的教育计划，加强对党员教育，使某些不合乎条件的党员经过教育后得以提高，合乎党员的条件”。通过教育改造使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逐渐符合条件是主要的一面，而对于完全不合乎条件的党员则应加以处置，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

教育培养干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

对于新干部，邓小平强调“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员不好当，一开始就让他树立党员义务权利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195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邓小平将这八个条件作为教育新同志的重要标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对于那些不愿遵守党员八条标准的同志，要劝他们出党；对于新党员同样要给予长期教育，必须合乎标准。”

对老干部的要求，邓小平认为“要更严格”。他指出，胜利后，有些老同志不求进步，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摆老资格，总想要照顾一下。对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老同志进步。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邓小平结合历史实际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德、才、资”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

突出了广东改革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他认为，尽管同在东亚文化圈，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领导的广东改革，却并不具备日本、韩国等国家在经济起飞时具有的国际环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广东通过加强同香港的联系，激发个人生产积极性，减少政府对经济管理的直接干预，注重发展国内市场及率先发展轻工业等举措，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发展效率上看，“广东在80年代中期仍以爆炸性的速度发展，起码达到了其他新兴工业区经济发展高峰期的速度”。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改革更是具有启蒙意义。自1978年以来，每年都有好几个来自苏联和东欧的重要代表团访问广东，考察改革的进程。有关广东的发展经验，时常出现在苏联内部的辩论中，用以支持和帮助制定他们的改革方针。越南、朝鲜这些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受中国影响，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相当一部分国家开始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从效果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改革是独树一帜的，“如果说广东的改革在中国是先行一步，那么对于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许就是先行两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中国人抓住了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深刻总结自身发展经验教训，希望摆脱经济停滞困境的机会，“使广东省先行了一大步”，进而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树立了重要典型。

对于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许就是“先行两步”

20世纪80年代末的广东同早十年的广东相比，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及行政效率等方面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傅高义并没有局限于从地方视角总结广东的改革成就，而是进一步